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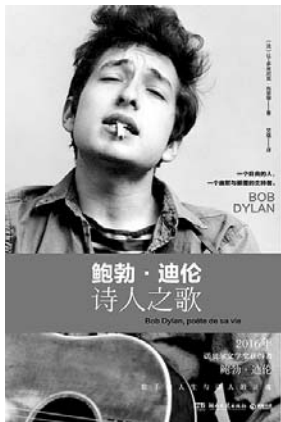
# 我们都是大数据时代的“透明人”

■ 新书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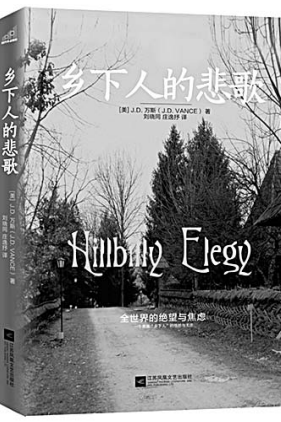
《大小生活都在念中》  
沈从文 著 刘红庆 编  
新星出版社

本书是沈从文在动荡岁月里写的家书(1966—1976)，这些保存下来的文字，因传达了作者真实的情感与思想而弥足珍贵，有忧患深沉的家国情怀，有真挚细腻的儿女情长，有徘徊在歧路的迷茫与惆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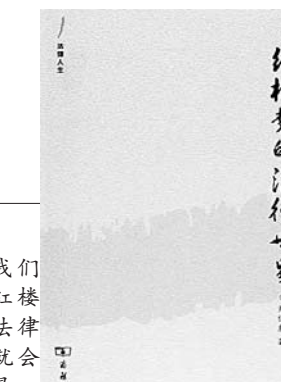
《鲍勃·迪伦：诗人之歌》  
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他的一生中，鲍勃·迪伦扮演了很多角色：他是伍迪·格里的精神传人，是广为人知的民谣歌手，是著名的摇滚明星，是孩子们可靠的父亲，也是孤独的吟游诗人……但是，有一种角色始终代表着他自己：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幽默与颠覆的支持者。



《乡下人的悲歌》  
JD·万斯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万斯自述其在俄亥俄州一个曾经繁华如今业已衰败的钢铁小镇(铁锈地带)成长，彷徨，奋斗最终考入常春藤名校，进入大企业任职高级管理的坎坷历程。



当我们进入《红楼梦》的法律世界，就会发现这是一座无比丰富的文化宝藏，它不仅可以为红学研究打开一条新的通道，其中还存在着可以与传统制度乃至现代制度互为解释的巨大空间。

百余年的红学研究实已走入死局。能够借以索隐的事件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发现新材料以供考证的希望也日益渺茫。现在，已经到了在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外，为红学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式的时候了。对于这个世纪及其以后的中国人，传统早已不是急欲抛弃的包袱和必欲砸碎的锁链，而是必须倍加保护和珍惜的固有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所表现并蕴藏的纯粹中国式的迷人文化将具有更加广泛的开放性和永久的生命力，它将吸引一切尊重并懂得中国文化的人进入其中，吸收、传承并创造性地予以转化。红楼梦的法律世界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红楼梦的法律世界》  
尹伊君 著  
商务印书馆

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国际网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这也就是至今仍在发酵的“棱镜门”事件。根据斯诺登披露的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接触到大量个人聊天日志、存储的数据、语音通信、文件传输、个人社交网络数据。“美国政府证实，它确实要求美国公司威瑞森(Verizon)提供数百万私人电话记录，其中包括个人电话的时长、通话地点、通话双方的电话号码”。

现实尚且如此，那是否意味，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可穿戴技术和眼球捕捉技术等高科技的突飞猛进，届时无所不在的数据采集会否更令公众束手无策呢？从现在开始，改进保护个人信息法律，这远比坐等日后数据采集更加泛滥时再纠偏更为容易。想必这也是本书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所在。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  
【美】特雷莎·M·佩顿 等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禾刀

2020年企业持有的数据量将超过2012年收集量的30倍”。另一方面，近年来关于大数据泄露公众个人信息的案例屡见不鲜。常常是这边我们刚买了房，还没来得及及办手续，那边就有装修公司上门预约业务。还没住上几年，就有中介打电话询问出租或出售意愿。如果数据的获取没有规则边界，那么就只剩下“裸奔”的利益。媒体多次披露，互联网上的个人信息贩卖已经形成黑色利益链。

内幕触目惊心。商业机构在“盗取”公众个人信息后，常常又以投其所好的方式出现在消费者面前。许多消费者只是觉得越来越方便，而很难意识到这种“贴心”服务是建立在自己信息被泄露基础之上。

值得警醒的是一些国家的公共机构亦借大数据技术之利对公民信息“巧取豪夺”。《大数据时代》作者舍恩伯格曾称，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向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泄露了一条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2007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

类智商的一次不经意“嘲弄”：由谷歌公司研造的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围棋，挑战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最终以4：1获胜。就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一言以蔽之——人工智能的胜利其实就是大数据的胜利。素以智慧自居的人类败给了自己亲手创造的大数据，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悖论”远不只此，我们甚至还没有大数据更了解我们自己。比如，当你在互联网上偶尔点开一本书，你可能很快就会发现，你点过的那本书，或者与其关联的信息总会及时出现在页面一角。你原本没什么特别感觉，经这么反复刺激，你很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改变原来的看法，至生成购买欲。还有，当我们打开APP，刚打出一个字，后面常常会联想出一串信息。这些信息绝非空穴来风，要么因为上了热搜榜，要么因为我们曾经浏览过，或者关注过关联的信息。

大数据蕴含无限商机。“数据挖掘的概念已经存在了至少20年”，“一项数据业务预测

## 一个家族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 胡艳丽

变的是“康圣人”，即康有为。他是能够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和西方文化知识糅合在一起，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答案的探索者。

从师康有为的四年，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气质性改变，他基本接受了康有为今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论的历史观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因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而热血沸腾。

书中，作者用“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来形容梁启超的政治生涯。政治上的失意，令梁启超终于看清了形势，在黯然退出政坛的同时，开始潜心学问，很快取得了丰硕成果。黄遵宪惊呼梁启超笔下“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料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梁启超从政治家向学问家的转变，对于其个人而言，很难简单评说是喜是忧，也难以评判这是中国的损失还是意外的收获。一个人无论取得怎样的成绩，终要回归家庭。梁启超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即使诸事繁忙，也不忘与儿女沟通联络感情，甚至还亲自为孩子

## 零度诱惑

□ 王干

《零度诱惑》这部小说波澜不停，叙事新奇，结构独特。作者敏锐于当下现象捕捉，写的是时代生活的世情乱象，人性中古老的幽谷险壑。从形式到内容，都给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

可以把《零度诱惑》的结构，视为“丛林结构”，丛林结构由若干树状结构构成。小说内外的故事是断断续续的，一个故事被解构为若干片段，作者不断回放、闪断故事片段，也在故事中插入、回叙其他的故事。与这些故事碎片对应的是，小说存在大量的分析和阐释。故事如土壤上的浓密枝干、繁茂的叶片，阐释的部分则成为向下生长的纵横的根脉。这种树形结构已经使小说变得“乱”和“芜杂”，由若干树形结构组成的丛林结构，则更加“乱”，也更加“芜杂”。

读这样的小说，会给你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你能感受到作者的气质包含在字里行间，读者可以看见作者胸中的汪洋恣肆的情感和见识，可以看见一个人执著于解构的天真和机趣。

《零度诱惑》这样的小说还能打动人，原因也是因为新人新作中那股子不讲规矩的劲头，有点像俗语说的，“乱拳打死老师傅”，不是说这“拳”打得有多好，但“乱拳”确实不是“老师傅”能打的，也不是“老师傅”招架得住的。

“大乱”后有“大治”，“乱”是起点，也是小说人物和纷繁时代的表征。“乱”完，小说也给人“玉宇澄清万里埃”之感。

审美习惯的顽固，习惯更迭之不易，往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五四开始文学革命，八十年代又经历了先锋文学的洗礼，然而，夹叙夹议抒情文的文体“知音体”，至今拥有广泛的读者；传播白领阶层职场经验，“杜拉拉”系列成了畅销书；官场小说因有大量的潜规则介绍，也成了受出版商欢迎的类型小说。市场销售状况和作品的叙事是今现代，二者之间常常无法成正比。

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锐作家的书，不可能在著作的发售量上打败成名已久的老作家。这是中国的阅读状况决定的。

这部小说写的是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读者进出作品非常容易，书里书外有强烈的对应感。

《零度诱惑》  
汪明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人生随时都可重新开始

□ 夏学杰

手法，比如故事里神仙常扮作穷酸样来试探人间的人是否善良诚实。这些超级粉丝来自不同层次，有公司副经理、画家、修士、晚年的老人、失业者。这是一部哲理小说，有故事没有情节，兰德用其一贯的手法——不太引人入胜的故事诠释她的思考。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这些超级粉丝们措手不及，又原形毕露。

即便是理想与人们擦肩而过，人们有时也不愿意去抓住，人们习惯了平庸，不愿意为理想而冒险，不愿意为理想而放弃既得利益。有很多人在失业或破产等重大打击之后反而走向了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无路可退，才会有破釜沉舟之后的绝地反击。

兰德说：我相信——我希望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生活。这等同于让生活与思想背道而

张爱玲说：生命在你手里像一条进跳的鱼，你又想抓住它又嫌腥气。

你是她的超级粉丝，你不停地给她写信，声称：“如果有一天，奇迹降临，你进入我的生活。我会放弃一切跟你在一起，献出我的全部生命”。然而，当偶像有一天真的降落在你面前时，你会坚守你的信念吗？安·兰德的小说《理想》大致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安·兰德系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一九三四年，兰德写了两个版本的《理想》，第一个版本是小说，因为对其不够满意，她只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随后，她又将其改写成了一出舞台剧。虽说兰德在生前没有出版《理想》的小说版，但她还是将其打字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办公室。

在小说中，凯伊·贡达是著名影星，因为牵扯到一桩谋杀案，她走进那些给她写过信的粉丝家中寻求庇护。这是一种中国人常用的试探

## 《红楼梦》中的法律世界

□ 理旭 整理

丰富的想象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从容不迫的优裕心态，创造出那么多令西方人赞不绝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国曾经被西方人称为“礼仪之邦”，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却只知道礼教束缚人、迫害人，不知道礼教规范人、教化人；只知道礼教“吃人”，不知道礼教“养人”。

《红楼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面的、细节生动的中国传统文化活的图像。它是一部浩瀚的文化海洋，几乎无所不包，具有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开放性。每一个人，纵使观点不同乃至相反，纵使怀有完全不同的兴趣和目的，都能够从《红楼梦》中发现令人惊喜、惊叹的文化宝藏。因此，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贾珍为何“扶拐”？

法学家不读《红楼梦》。或者青年时虽曾读过，成年后因有人权、人命关天的大事，无暇顾及。所以，一百多年来，尽管红学是非非，恩恩怨怨，波谲云诡，热闹非凡，却从没有法学家问津染指，倒也“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法学家不研究《红楼梦》，实在是红学的重大损失。

历来的红学家，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史出身。它给红学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文本内重视文学性的鉴赏、评析和对不同版本的校勘、比较，文本外则醉心于以曹家历史为核心的考证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索隐，反而对文本内涉及的重要制度关注不够。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对《红楼梦》所揭示的重大问题的理解，同时也失去了从制度上对许多疑难问题的考证和论证。

《红楼梦》。岂不知书中有不少地方透露出作者生活的社会背景。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借子兴口说道：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

第七回中，还是这个冷子兴：

……因多吃了两杯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送解还乡。

所谓“生齿日繁”，以及对“来历不明”者“送解还乡”，熟悉清代法律制度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人口在明末战乱后锐减，康熙末年还只有二千多万，经过清初的休养生息，雍正二年增长到三千多万，乾隆初期突破一亿，中期突破两亿，晚期达到四亿，这一人口记录一直保持到1949年。清承明制，实行保甲法，保甲条例规定，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每户岁给门牌，悬挂门首，

“出注所往，入籍所来”。顺治、康熙时期，由于人口稀少，保甲制度只是虚于应付，并未真正落实。乾隆初年，人口暴涨，“生齿日繁”，迁徙、流动加剧，仅北京就聚集了数十万流动人口，“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而且，正是在乾隆初年及其以后的保甲制度中，才出现并强调了对“来历不明”者的察究报告制度。

红学研究的新视角

当我们进入《红楼梦》的法律世界，就会发现这是一座无比丰富的文化宝藏，它不仅可以为红学研究打开一条新的通道，其中还存在着可以与传统制度乃至现代制度互为解释的巨大空间。这里所说的法律，并不是西方学科分类意义上的“法律”，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法

“生齿日繁”暗示了什么

再如《红楼梦》的写作时代，考证派和索隐派费了不少口舌。索隐派一般认为《红楼梦》写于雍正、乾隆以前，是“反清复明”人士所著，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论证“明本”

■ 速读

传统文化活的图像

《红楼梦》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由鼎盛向衰败转折阶段的文化现象。它是复杂的，既闪烁着美轮美奂的光彩，也折射出丑恶肮脏的伤疤。它的复杂性，决定了后世学者对它的复杂、暧昧心态。曹雪芹的高明，在于他并不对优劣好坏作出自己的主观判断，而只是将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盘托出，由每个不同的人自己去品味决断。然而，遗憾的是，经过一百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这种文化今天离我们已越来越远，如同一个遥远的梦。

一旦进入《红楼梦》的世界，我们这才发现，那个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无迹可寻，在典籍中已经变得尘封僵冷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即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好似中国文化的钟灵之气，一下子全部集中于曹雪芹一人一身，并在《红楼梦》中得到最集中、最完美、最鲜活的体现。一部《红楼梦》，就是一部“活的”中国文化。

我们不应仅仅将《红楼梦》当作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来读，它也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既批判传统社会，也批判现代社会。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欣赏《红楼梦》文学之美的同时，更应该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它所创造出来的丰富的想象力、精致的生活和艺术，反衬出现代社会的平庸、粗俗以及想象力的缺失。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概念，完全建立在西方话语霸权和现代西方文明判断的基础之上，被错误地贴上“封建的”标签，成为“愚昧的”、“落后的”代名词。现在的中国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在传统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中国人同时也曾经拥有那么雅致且富有情味的生活方式，有着那么